



刀剑出晋阳 锐甲卫家国

张 悦

械,多被调拨至位于晋阳城内的北都军器监,借对抗突厥骑兵之机实战检验与工艺改良。依托这套试验研发体系,唐代相继诞生陌刀、伏远弩、绞车弩等新式兵器。

并州冶铁技铸甲兵

晋阳的冶铁技术能够在隋唐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其技术根基可追溯至北齐。当时,冶金名家冢毋怀文所创的灌钢法在晋阳推广,推动本地冶铸技术实现跨越式提升。该技艺以熔融生铁浇灌熟铁料块,经反复淬炼锻打,可炼制出质地坚硬、锋刃锐利的优质钢材,以此打造的“宿铁刀”,能够连续劈砍三十层铁甲,性能极为优异。这套先进炼钢工艺在晋阳落地生根、迭代精进,成为本地军械锻造的核心技术支撑。

隋末,李渊驻守太原,晋阳城内充盈的军械储备为李唐起兵立国奠定军械基础;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亦依托晋阳成熟冶铸体系锻造精良军备,整军砺武、北御突厥;安史之乱中,名将李光弼坚守太原,凭借本地自给自足的军械产能,以坚城锐城大破叛军,力挽河东战局。诸多史实充分佐证,古代太原冶铁工艺精湛、产能充沛,是维系军政安稳之核心所在。

晋阳冶铸业在唐代迎来规模化发展,煤炭的普及运用成为关键要素。考古发现,晋阳古城唐代手工业作坊遗址中清理出34处灶址、642个煤渣坑,以及坩埚残片、铜铁残渣、蓄水与排水设施等,生产体系完备。相较于木炭,煤炭燃烧温度更高,燃烧持久,适配高温冶铸需求。遗址铜铁残渣共存,印证此地可同步开展铜铁冶炼与器物铸造,为军械的量产奠定工艺与产能基础。依托成熟的钢铁技艺与煤炭冶铸优势,唐代在晋阳实现制式军械规模化生产,精准适配大唐北境边防军事需求。针对突厥骑兵作战特点,晋阳城内作坊批量锻造马槊、陌刀等长柄重兵器;量产唐军制式横刀,供应河东、河北等地驻军;同时锻打加工各类铁制甲片,经锻打、淬火、打磨、上漆等多道工序,组装成明光甲、山文甲、细鳞甲等精良铠甲,品类齐全、工艺精良。

晋阳造械业保军需

在冷兵器时代,铠甲主要分为铁甲、皮甲两大品类,二者功能互补、各司其职。隋唐时期,铁甲为重甲主力,适配主力步骑兵野战与边防攻坚战所用,而皮甲凭借质地轻便、造价低廉、机动灵活的优势,主要配属轻装步兵、小队骑兵与斥候侦察,是彼时防御性军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官方定型十三种制式铠甲,皮甲位列其中,充分体现其军备价值。

作为唐代北方军械生产重镇,晋阳亦承担皮甲与皮革军械配套生产的任务。据《新唐书》记载,甲坊署“掌出纳甲冑、绶绳、筋角、杂作及工匠”,可见该部门专门执掌

甲冑、绳线、筋角、皮革等军备物料的收纳调配与精工制作,说明当时晋阳城已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皮革加工作坊集群。山西中部地区在隋唐时期农牧兼具、物产丰饶,本地盛产优质牛羊皮,为晋阳皮甲的量产提供就近且充足的原料保障,大幅降低军备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当地工匠深谙传统鞣制技艺,通过多道精细工序鞣制生皮,辅以刷漆防腐工艺,再经裁切、定型、编缀,制成规整耐用的漆皮甲片,以皮绳串联成完整皮甲。有学者认为,除制式皮甲外,晋阳皮革工坊还承接各类军用配套物资生产,涵盖弓袋、箭囊、马鞍革带、盾牌皮革蒙层、军士战靴等全套军需用品,保障军队日常作战与行军所需。整体来看,唐代晋阳军械产业布局科学、分工精细,冶铸、皮革、制弓、造箭等作坊分区布设、各司其职,已经形成完备的生产链条。

千载回望,太原炉火不息、锋刃长存、兵利甲坚,这座三晋古都以雄厚军械生产实力,在隋唐五代的烽火硝烟中书写了“刀剑出晋阳、锐甲卫家国”的千古传奇。

且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十一年正月二日發東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承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盛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

古籍所載北都軍器監設立背景（資料圖片）

晋阳手工业（11）



太原,古称晋阳,扼山西中部,处汾河之滨,自古有“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之称。秦汉时期,朝廷设太原郡抵御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亦为兵家必争之地;隋朝建立后,朝廷置总管府控御北疆,晋阳的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自晋阳起兵,开唐代基业。入唐后,晋阳升为北部,李白曾赞曰:“雄藩巨镇,非贤莫居。”晋阳不仅是北方边防重镇,也是盛唐官方设立的国家级军械制造基地。

北都军器监掌武备

军器监是古代掌管兵器制造的中央官署名。史载,该官署始设于北周建德四年(575),从北周至隋代,军器监多为临时机构,通常分散于各地驻防或作战的军队之中,战时设立,战争结束就被裁撤。唐朝成立之初,突厥骑兵在大草原上所向披靡,边境防御压力巨大。于是朝廷在沿袭前朝制度基础上,将军器监设为常设机构。据《旧唐书》记载,唐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唐玄宗李隆基巡幸至晋阳。随行的兵部尚书张说向玄宗进言,建议“因行幸,振威耀武”。为巩固北部边防,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在晋阳设置了军器监,名北都军器监。

北都军器监是唐代重要的军械造办官署,建制完备。据《唐六典》《通典》等史料记载,该官署设监一员(正四品上)、少监一员、丞二员、主簿一员、录事一员,主官常由太原尹兼任,下辖甲坊署、弩坊署两大分支机构。弩坊署统管矛、弓、排弩、刀箭等攻守器械物料收发,统辖配套工坊工匠;甲坊署专司甲冑、筋角等防护军备储备调配,管理各类造作单元。两类署下的生产工场统称“作”,弩坊诸作锻造各式攻守器械,甲坊诸作制作护身甲冑;两署主事各管本部造作,督造军备,甄别器物好坏。

有学者认为,唐时,长安中央及各州军器监新制军

“多咱”在山西方言里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这一方言词不仅在山西常见,而且通用于北方各地。

“多咱”一词古已有之。许衡《鲁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圣人教人,今日学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穷究到处是。明日再去为一件,又恁的穷究。今日明日,只管穷究将去。或看文书,评论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见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这几般一件件分拆得是呵,便是‘格物’。这般穷究了,多咱心里都理会得,久而闻天下事,好的、歹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无些昏蔽,便是‘致知’。”

许衡是金元之际怀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这表明“多咱”一词用于表示“什么时候”之义,至晚从金元时期,就在北方方言口语中沿用下来。

从字面上来看,“多咱”的“咱”,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应该是记音。所以,在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中,还出现了“多噱”“多簪”“多僮”“多僮”“多早”“多怎”等多种形式,皆为音同或音近的异写。如,《聊斋俚曲·富贵神仙》:“你看是多噱晚,才把门来叫?”《醒世姻缘传》第十二回:“到黑夜,不知多咎就吊杀在俺娘那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她到底多僮来看我呀?”《三侠五义》第三回:“从此到京,尚有几天路程,似这等走法,不知多僮才到京中?”《红楼梦》第六十六回:“这人此刻不都在这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济公全传》第五十五回:“和尚,你给我相相面,多怎能好?”由此可见,元代以后,音同“多咱”,义为“什么时候”的词语,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常用口语词。

学术界则普遍认为,多咱的“咱”,是“早晚”二字的合音(切音)形式。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解释:“早晚变成一个合音字,从前写‘噱’或‘咱’,现代多写作‘僮’。”著名学者李行健在《现代汉语方言词语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一文中亦提出:“‘多噱’是‘什么时候’的意思,是从‘多早晚’连读音变缩减而来的。‘早晚’变成‘噱’(也写作‘咱’),是取‘早’的声母和‘晚’的韵母拼合而成的。”

在近现代汉语中,合音词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何消吩咐”,“消”是“需要”二字的合音。又比如“甬”,就是“不用”二字的合音。一般来说,发生合音的两字,后一个音节往往是零声母音节(指没有辅音声母,仅由韵母构成)。这样在急说快读情况下,两个音节很容易拼读成一个音节。“早晚”急速连读,就读成了zan。

“咱”是“早晚”二字的合音,那么,在金元时期,“早晚”一词又作何讲呢?

吕叔湘先生《近代汉语指代词》指出:“早晚是询问时间的词,意思是‘什么时候’,最早见于晋代文献,一直用到宋代。”大约到了元代,出现了由“这”“那”构成的复合词“这早晚”“那早晚”,意为“这时候”“那时候”。此时,“早晚”的疑问意味已大大减弱,难以承担表时间疑问代词的功能,于是“多早晚”应运而生。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这样解释:“京中俗语,谓何时曰多早晚。”到了明清时期,“多早晚”又经历了合音化,变为“多咱”,在北方方言地区继续使用,一直沿用至今。



叔虞七鼎见周礼

程杰珍

晋祠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步入唐叔虞祠正殿,唐叔虞塑像前方,陈列着一排仿古青铜礼器,大小有序、形制规整、排布井然。看懂它们,就读懂了整个周王朝的权力秩序。

我们要先弄明白什么叫“列鼎”。列鼎是一套纹饰一致、造型相同,唯独尺寸严格递减的“等级套餐”。它是西周王室身份等级的硬性界定,是周代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它以奇数为固定规制,专门用于祭祀、宴飨等重大礼仪场合。与之配套的是列簋。鼎奇簋偶,尊卑立见。鼎盛肉;簋装粮。

据《春秋公羊传》汉代注疏记载,西周礼制等级分明:天子九鼎八簋、大国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普通士人三鼎二簋或一鼎无簋。这套严苛的器物规制是西周维系宗法分封制度的重要基石。

天子九鼎盛放:牛、羊、乳猪、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盛放:牛、羊、乳猪、鱼、干肉、牲肚、猪肉。

小小礼器,承载着周王朝严谨的礼乐法度与尊卑秩序。唐叔虞作为周成王之弟、晋国开国始祖,是

王室分封的诸侯,礼制规格严格对应七鼎六簋,少了两道“配菜”,鲜鱼和鲜肉干。到卿大夫五鼎规格,就不能再用牛,只备羊、猪二牲。再往下的士阶层,三鼎、一鼎的祭品还要继续精简,牲肉品级层层递减。

唐叔虞祠只还原了诸侯身份的七鼎规制陈设,未配齐标准的六簋,仅有两尊簋器点缀。若将唐叔虞祠与圣母殿陈设对比,更能读懂周代礼制的内涵。圣母殿供奉周成王与唐叔虞之母,即周武王王后邑姜,殿前并无鼎簋陈设。这是因为男女祀礼自古不同。男子先祖,以食荐天,用鼎簋,讲等级、论爵位。女性先妣,以洁致敬,用盥盘,重虔诚、修明德。圣母殿前摆着一排铜盥,在古代是沃盥礼器。祭祀之前,净手洁心,以示对圣母贤德的崇敬。

这套“以器明礼、以物定序”的列鼎文化,是跨越三千年的礼制信使,将周代典章制度,转化为可观、可感的实景。读懂这七鼎,便读懂了周礼何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读懂了中华礼乐文化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核心底蕴。

代州文庙大成殿

王 斌

殿内的八卦攒顶藻井,是大成殿巧夺天工的建筑精髓,也为这座古殿增添了神秘别致的色彩。藻井以纯桦卯结构层层向内收拢,由方形过渡为八边形,最终汇聚为圆形穹顶,暗合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念,将易学八卦理念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融为一体。数百组斗拱相互勾连,不施一钉一胶却稳固如初,四周天花板遍绘各式龙纹彩绘,笔墨灵动、气韵古朴。

若说形制与木构是大成殿的外在别致,檐角危立的“走投无路四将”,则是其内在独有的文化创举。天下文庙檐角皆安放仙禽瑞兽、骑凤仙人,以求祥瑞安宁,唯独代州文庙大成殿四角,塑虎涓、韩信、周瑜、罗成四尊琉璃武将。中原文庙以圣贤教化学子,而边塞代州因地制宜,以败将心性缺憾警醒世人,用姚贤、骄矜、气窄、决绝四类人生弊病,教化刚勇尚武的边地士子修德自省、收敛锋芒。

殿内供奉孔子及四配塑像,梁柱之上留存清雍正、乾隆两代帝王御题楹联,匾额庄重、陈设规整,恪守庙儒祭祀礼制;外部高台雄阔、蓝瓦映天,檐角弧将守望古城,中原礼乐形制与雁门边塞风骨在此完美交融。六百年来,大成殿历经烽烟动荡、岁月更迭,既坚守着尊孔崇儒的正统文脉,又不断融入乡土智慧与地域性格,把建筑技艺、等级礼制、哲学思想、边塞教化融为一体。

一座大成殿,半部代州文脉史。它以破格的礼制、精巧的木构、别致的琉璃、独有的檐角警训,跳出传统文庙的固化范式,将中原儒学礼制落地于雁门关下的边塞土地。巍峨殿宇屹立至今,既承载着千年斯文礼乐,又镌刻着晋北独有的人文智慧,它以独一无二的别致风貌,静静诉说着代州文武共生、兼容并蓄的悠久地域文明。

在太原很多史籍中,经常可以看到戴梦熊的名字。这位浙江人,在清康熙十五年(1676),以监生身份出任阳曲县知县,在任六载。

《乾隆太原府志》记载:“(戴梦熊)知阳曲县。为政持大体,明敏干练,吏胥不敢欺。莅任六载,邑中利弊,兴革无遗。尝设义学,以训贫家子弟。又尝葺两庠、八蜡、文昌、狄公等庙,醵补《宝贤堂法帖》,士民咸爱戴之。”

明末以降,晋阳大地屡遭浩劫:先是李自成农民军席卷太原,城池受创;清军入关后,八旗军与起义军反复攻防拉锯;清顺治六年(1649),大同总兵姜瓖举兵反清,其部将姜建勋率军南下围困太原,与清军展开惨烈决战。接连数十年的兵戈杀伐,山河残破、生灵涂炭,太原城乡遍地留下战火焚掠的深重疮痍。

戴梦熊清康熙中期出任阳曲县知县时,正值国势兴盛之初。然而作为“三晋首邑”的阳曲,因明末清初的战乱透支,百业凋敝,民生税负依旧沉重。正如清康熙《阳曲县志》所载:“夫军需孔亟则轮輶宣先,乃麦未翻浪,夏税已催,谷方秧节,秋粮早比,吏不得不追乎。民不得不称贷,三时勤苦,犹不足偿称贷之利。民安得不愈贫乎。”麦穗尚未饱满翻浪,夏税已然严催;禾苗才初萌新秧,秋粮便提前征比。百姓终年躬耕劳碌,却难抵层层赋税盘剥,只能借贷度日,家境日益贫寒。战乱重创叠加苛赋重压,让晋阳千年文脉日渐衰微。“邇来人文稍逊,揆厥所由,毋亦社学未立,故读书之士少乎。”学堂荒废,教化缺位、寒门无力读书,致使三晋首邑人文不振、风雅渐歇。

戴梦熊赴任后,开启了兴治安民、重振晋阳文脉的治邑之举。

对于启蒙教育缺失的状况,戴梦熊决定“爱仿前人之意,不袭社学之名,谓之曰义,盖欲为师者,归斯受之也”,仿照前人之意,但不袭用社学之名,而称之为“义学”。欲使为师者,皆归于此处,授教于此,以传道授业解惑。

戴梦熊在县城内设立了六处义学。充分利用现有庙宇,“即择祠堂寺院冲要洁净者,打扫修葺”。东路义学在地藏庵内,中路义学在黄帝庙内,南路义学在巡抚白公祠内,南关义学在狄梁公祠内,西路义学在忠烈祠内,北路义学在普光寺内。

当时戴梦熊管辖的阳曲县人口有五万七千余。六处义学和官办儒学,应该能保证大部分适龄儿童的入学要求。

这些义学的“桌椅笔砚,著令学生自备”。为保证义学能长期有效地办下去,戴梦熊还为此六处义学设置了“义学田地”,共计田地七顷一十八亩三分五厘,除却正项供赋之外,这些田地的所有租谷皆由义学之师收用。以田租资助义学,确保师资有所养,学务得以绵延。

戴梦熊创办义学,“俾附近者得以就教”,附近子弟得以就近求学。义学所聘请教师的薪酬,最初都由戴梦熊捐出自己的俸禄发放,后来,才设立学田以供养师生。

在义学从学的童子,每人皆有资给,灯油、煤炭、试卷等物,亦不时颁发,以资其用。邻近各县闻风前来就学者众多,一切馆谷等所需之资,皆由公家料理,无须学子忧心。

在戴梦熊创办义学的160年后,《道光阳曲县志》记载,戴梦熊义学详“地方官于政治之暇,亲赴义学内,查其勤惰。读书者,背书一二章。作文者,令作起承转合一二个。事完即出,而季考月课之费亦可省矣”。地方官对于义学不能一办了之,而是要在政务之余到义学亲自检查。这样一来,校方对学生的定时考校就可以免除,亦可节省费用。

戴梦熊创办的义学,因为其扎实可行的制度,得以长久延续。到了清道光年间,义学田地还增加了45亩。阳曲县生员李丕承记载,“真数十年未有也,使侯之司牧于兹者,人人尽如戴侯,又何患晋阳人文之盛,不如古晋哉”。



大成殿檐角的「走投无路四将」之一（资料图片）